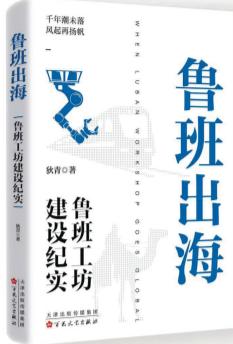




狄青 讲述鲁班工坊的故事

记者 田莹



校全都参与其中,各院校结合自身特点和专业优势,设计特色专业、提供人才支撑,全情投入,才使得鲁班工坊能够迅速从本土品牌成长为国际名片。”

狄青极为推崇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吕景泉教授开创的EPIP(工程实践创新项目)教学模式,他说:“吕教授研究生毕业后没有直接站上讲台,而是深入实训基地,向老师傅学车钳铣刨,长期在企业扎根,积累实践经验。正是这种深耕一线的执着坚守,催生了具有开创性的EPIP教学模式——以工程化、实践性、创新型、项目式为核心理念,诠释了天津职业教育‘工学并举’的历史传承。”

这个理念到底牛在哪儿?因为它系统性地整合了工程实践与创新项目,回应了全球职业教育的共同难题——如何培养既能执行又能创新的技术人才,并通过中国特色项目制教学落地。狄青解释道:“EPIP教学模式通过真实项目驱动,将标准化操作内化为创新基础。比如,在数控机床教学中,要求学生在掌握标准化操作的同时,还要针对本地需求来设计工艺方案。这种本土化创新,正是EPIP的精髓,也是中国职业教育向世界输出的原创理念。”这种模式,让中国的职业教育实践成果走向了国际舞台,实现了历史性跨越。

援教的艰辛与温暖背后 是技术输出带来的变革

在长达5年的采访中,狄青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故事,而最让他心头发烫的,是那些在异国他乡默默耕耘的教育工作者——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,却饱含着动人的坚守。

江峰和高洋夫妇是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的教师,他们在埃塞俄比亚从事教育援外工作已近15年。他们的儿子江天亚出生在非洲,名字中的“天”与“亚”两个字,分别代表故乡天津和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。当狄青见到高洋老师时,她正为再次启程前往埃塞俄比亚做准备——既是为当地鲁班工坊安排后续教学工作,也是为探望仍在当地坚守的丈夫。

2011年,江峰刚刚到埃塞俄比亚援教时,目之所及,教学条件令人心酸:最基本的教学设备和实验器材都极度匮乏,许多实践课只能通过观看视频来完成;教材稀缺,常常几个学生共用一本书。面对困境,他没有抱怨,而是主动调整教学计划,努力适应实际情况。这份真诚与坚持,让埃塞俄比亚教育部和当地院校的工作人员深受感动,他们一再挽留江峰,他的教学任期一直在延长。

生活在埃塞俄比亚,同样面临着种种“挑战”。江峰夫妇只能每两周去市中心采购一次食材,从驻地到最近的超市,公交车要间隔几个小时才有一班,他们多是步行往返,路程要耗费一个多小时。土路坑洼不平,鞋子穿三四个月就会磨破底。狄青感慨:“高老师讲述这些经历的时候,语气平静得就像在谈论天气,仿佛这只是再平常不过

的生活插曲,但即便是天气,非洲的气候我们也不太容易适应。”

2021年,当得知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要在埃塞俄比亚筹建鲁班工坊时,江峰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,并成为这个中非合作项目的负责人。

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院长郑勇峰,向狄青讲述了全球首个鲁班工坊在泰国大城技术学院初创的故事。那是2016年,郑勇峰还是一名青年教师。他和同事拉着塞满实训设备散件的行李箱抵达泰国时,距离揭牌仪式只剩下一个多月。

泰国潮湿闷热的天气,让工作变得格外困难。语言的障碍也带来了不少趣事——中国教师不会泰语,泰国教师的英语也不够流利,双方主要靠画图和手势沟通。渐渐地,他们竟琢磨出一套独特的“电路图对话”,简单画个电路图,不仅能讨论教学内容,还能交流日常生活。在这种特殊的互动中,两国教师结下了深厚友谊。后来,当泰国教师结婚时,还不忘给已经回国的中国同事发来喜讯。

这些温馨瞬间的背后,是技术输出带来的深刻变革。在巴基斯坦,经过培训的学员成为中资铁路售后服务的骨干;塔吉克斯坦光伏专业的毕业生,是中国电站争相聘用的技术人才;而英国鲁班工坊的产品展示窗口,则为天津企业打开了海外市场。正如狄青所说:“鲁班工坊就像一个个技术基站,让中国企业在当地扎根生长。”

鲁班工坊在海外的受欢迎程度超出想象。狄青在采访中收集了太多的故事:在乌兹别克斯坦,家长们为了让孩子获得进入鲁班工坊学习的机会,凌晨就到报名点排队;在印度,当地政府主动前来寻求合作,希望引入天津的职业教育模式,因为他们看到了周边国家的学员通过这项培训获得了更高的收入。

有一位鲁班工坊的老师告诉狄青,在非洲的工坊开放日,村民自发带着水果来感谢中国的教师们。这种认可,比任何宣传都更有力量。这些细节让狄青深刻理解到,技术输出为当地百姓送去的不仅是谋生技能,更是尊严。

展示职业教育实力 工匠精神没有国界

2020年,狄青想静下心来写点东西,正巧发现了鲁班工坊这个发源于天津的国际项目。“我跑了二十多年基层,对天津的工业发展和教育脉络还是比较熟悉的,直觉告诉我,这里面会有值得写的故事。”他坦言,与百花文艺出版社沟通时,双方对选题一拍即合,都认为有必要为这个源于天津的创新实践留下完整的记录。

写作过程中遇到的波折远远超过了预期。职业教育领域的专业性、跨国项目的复杂性,让采访充满了挑战。而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,也让本就复杂的采访雪上加霜。“在海外的天津教师回不来,国内的职业院校又因为封闭管理无法进入。”狄青

回忆说,在最困难的时候,他只能通过微信语音和越洋电话搜集素材。即便如此,他也从没想过放弃。

在他看来,鲁班工坊的故事有三个必须被记录的理由:一是天津作为发源地的意义,这套从天津走出去的模式,已成为中国工匠精神的“国际名片”,这段故事应该由更了解天津工业基因和城市发展脉络的作家来完成;二是那些用青春铺就海外职业教育之路的建设者,不该被遗忘,他们在异国他乡传授先进技术的同时,更播撒着友谊的火种;三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“云端坚守”,大家靠视屏搞“云揭牌”、隔着屏幕传授技术,这些在困境中迸发出的创新行动,都有着鲜活的时代印记。



狄青

天津人,作家,天津市文艺评论家协会驻会副主席,《文学自由谈》杂志主编。出版《卡尔维诺年代》与《文学相关的一些话》《回马村记》等著作。

狄青访谈
**天津手艺人有务实精神
耍嘴皮子不如亮真本事**

记者:您生在天津,长在天津,天津的城市气质、工业文化是如何影响您的关注视角和创作风格的?

狄青:我曾在天津的一家杂志社工作多年,早期跑企业,去过很多工厂,后来跑农村,到过六七百个村庄,对基层太熟悉了。咱天津近代工业有太多的第一,技术工人历来深受重视。天津是最早对技术工人评级的城市之一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八级钳工的工资、社会地位都堪比今天的大学教授。这种对手艺人的敬重,造就了天津人“耍嘴皮子不如亮真本事”的务实精神。

这种城市气质也深深影响了我的创作,教我学会了接地气的观察视角。当记者时记录的那些面孔,都成了我的故事宝库,所以我的小说更关注市井巷陌的普通人,关注他们的坚韧、憨厚、狡黠,甚至带点自嘲的生存智慧。而在随笔创作中,我并不喜欢摆出一张教化者的面孔,面对种种文化现象,我可以惊叹、慨叹、自负、反思……我不想做读者的人生导师,而想成为他们那个眼光犀利而又平实风趣的老友。

记者:创作《鲁班出海》这本书的过程中,最大的挑战是什么?

狄青:怎么才能把严肃的题材写活,是我遇到的最大挑战。这本书涉及政策、外交、教育等方方面面,可以说“严谨”是创作的第一要义。但如果写得太生硬,通篇都是建了多少工坊、培训了多少工人等冰冷的数据,纪实文学就成了汇报材料,失去了可读性。因此,在创作中我尽量平衡真实性、准确性和艺术表达的关系,尝试通过一个个人物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来呈现这件事的意义。这些人物一立起来,这本书就有了温度。

记者:现在的年轻人还会认可“手艺值钱”这个理儿吗?

狄青:不仅会认可,而且手艺越来越吃香了!国家大力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,提出要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、能工巧匠、大国工匠。在天津,这一传统优势正在焕发新活力。我去渤海职业技术学院采访,有个学化工的小伙子,实习时在车间调试设备,企业直接开价月薪过万,比坐办公室的白领还要高。他说:“我爷爷是老工人,总说有手艺饿不着,现在我信了。”

天津职业教育有个鲜明特点:传承与创新并重。我们既有自古沿袭延续下来的工匠精神,又紧跟国家产业升级的需求,像新能源汽车、人工智能、生物医药这些新兴产业,不少职业院校都开设了对应专业。现在的年轻人很务实,他们看到国家政策对职业教育的支持,看到高级技工享受人才补贴,自然就明白了“一技在手,终身受益”的道理。不少“90后”“00后”也在用实力证明: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今天,技术工人的职业前景越来越广阔了。

记者:在《鲁班出海》出版之后,您有哪些新的创作计划?

狄青:这两年我一直揣着一个念想,就是写一部天津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。专写当下的企业,还有那些新工人人群——他们手里攥着新技术,身上带着时代的精气神,这是之前很多天津工业题材的作品里相对不太见的。我平时工作比较忙,正经坐下来写长篇的时间少,倒是零零碎碎写了不少随笔、杂文。可这部长篇不一样,它在我脑子里盘桓太久,哪怕写得慢,哪怕要在零碎时间里一点点抠,我也得把它完成。我知道写身边人、眼前事很难,更难的是要写出时代的筋骨。但我就是想试试,写出他们身上那股不服输的劲儿,写出天津工业现在的模样。我觉得自己不仅是想写一段故事,更是想为这片土地的当下,留下点实在的文学印记。

(图片由狄青提供)

近日,由狄青创作、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、聚焦天津职业教育海外影响力的大篇报告文学《鲁班出海》,在文化圈与教育界引起关注。这本书深度解析了天津开创的职业教育国际品牌——鲁班工坊的全球化发展历程。狄青认为,鲁班工坊不仅是天津职业教育的成果,更是中国工匠精神与现代教育理念的融合体:“它带着天津的基因在全球绽放,这种跨越国界的生命力,值得被认真书写。”

天津职业教育底蕴深厚 “工学并举”传承百余年

“鲁班工坊从天津发轫并走向世界,绝非偶然。”狄青说,在《鲁班出海》一书中,有一个章节题为“为什么是天津”,狄青在文中细数天津近代史上创造的各种第一。他分析,当年在天津,走河道可以通大江南北,走海路可以与世界相连,独特的区位优势,使天津成为近代工商业的摇篮,更孕育出中国最早一批产业工人。正是因为有了他们,天津才有了这么多引以为傲的第一。

通过查阅历史资料,狄青了解到:“就拿赫赫有名的北洋水师大沽船坞来说,那是中国第一个集修船、造船、生产军火、工业技能人才培养为一体的综合性军事工业生产基地。早期大沽船坞的技术工人始终保持在半数以上,凡是在船坞工作过的工人,去其他工厂应聘,不用考试就能录用。大沽船坞为天津及周边地区培养和输送了大量技艺高超的工人。”

回望一百余年以前的天津:开滦矿务局被誉为“北方民族工业的摇篮”,北洋电报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工业大学学校,北洋工艺学堂提出的“工学并举”理念是实业教育的先声。由此,狄青认为:职业教育的基因早已深植于这座城市的血脉之中。

随着对鲁班工坊项目的深入采访和跟进,狄青愈发为天津的职业教育发展感到自豪:“天津是全国职业教育的高地。特别是在鲁班工坊项目的建设中,可以说是倾全市职业教育院校之力,从中职、高职到本科院

讲述

《经典的炼成》开启一场穿越百年的思想对话 重返鲁迅的精神故乡

口述 阎晶明 整理 何玉新



阎晶明

的十篇文学随笔。这个书名是书中谈《孔乙己》的文章的标题,也是我在陕西的《小说评论》杂志上开的一个专栏的名称。我的目标是,对于鲁迅小说中那些社会影响力大、文化史上有地位、研究者关注和分歧都比较多的作品,逐篇进行分析。我也想做一点关于鲁迅小说专题性的研究,比如鲁迅小说中对衣着的描写。

其实关于鲁迅小说的研究文章、著作已经有了很多,不需要我们再来增加什么。但这就是经典的魅力,研究者评论得再多,阅读者的感受还是没有完完全全地被说出来。当我们读鲁迅作品的时候,总觉得自己也想说一说、评一评。所以在每篇文章开头我都要强调一下,在我看来,这篇小说最独特的是什么。

当下我们研究鲁迅
应该学习他的凝练

《经典的炼成》这本书,收录了我近年来写的关于鲁迅及其作品研究

比如《故乡》,早已经进入了中学语文教材,上过初中的人基本都知道,但专门研究它的文章比较少。我想提出一个话题:《故乡》并不那么简单,它很复杂,不光是要分析小说的艺术性,还要研究它的发生,鲁迅为什么要写这篇小说,他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态?这篇小说既有故事性,也有杂文式的议论、说理,还有散文式的抒情,鲁迅是怎么在这几千字的篇幅里,把这三者糅合到一起的?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。

《祝福》讲的是祥林嫂的故事,我也要找到它在鲁迅小说里面的不同点,这个不同点不一定是我的发现,但是它非常重要。祥林嫂在鲁镇打工的时间比较短,不过她一生的命运都是在鲁镇这个舞台上展现出来的。鲁迅并没有从祥林嫂年轻时写起,然后不停地转场,到最后离世,而是直接写了发生在鲁镇的她的命运交响。

说通俗一点,这就是高级小说,它的戏剧性、小说性都体现于此。这些可能别的研究者也谈过,但是我认为还需要不断地强化。他能在很短的篇幅内,写出一个人一生的命运,所以今天的作家还是应该研究鲁迅,去学习他是怎么提炼、怎么浓缩、怎

么挖掘的。

《一件小事》作为小说来讲,其实不大成立的,但它在鲁迅小说中又非常重要。比如其中提到人力车夫,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北京,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。从胡适到闻一多、徐志摩,各个流派、各种观念的作家,都在作品中写过人力车夫。而鲁迅的《一件小事》里面的车夫形象,有太多值得分析的东西,既代表了时代,又有其典型性。

鲁迅没有闲笔废笔 每一笔都值得回味

鲁迅的学生孙伏园曾问他,你写了这么多小说,自己最满意的是哪一篇?鲁迅回答,是《孔乙己》。在不足3000字的文章里,他写出了一个苦人的凉薄,而且用的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写法,是中国风格。

当今网络时代,年轻人都说,脱不下孔乙己这件长衫。孔乙己成了热词,这个热词跟长衫有关,变成一个社会身份的符号,变成一个人的身份和现实处境之间产生差距和错位的标志。

鲁迅写孔乙己这件长衫,不是他凭空想象出来的,而是对生活的提炼。在孔乙己所处的时代,长衫是脱不下去的一件衣服。过去绍兴的算命先生,自己穷得活着都难,但身上的长衫却是他身份的标志,解开花衫,里面可能连件背心都没有。当地老百姓都有这个认知,而鲁迅把它用在了小说中。

从五四运动时期到上世纪30年代,长衫一直是身份的标志。鲁迅写过一篇杂文,讲一辆人力车轧到一个

人的长衫,车夫遭毒打,最后还被抓了起来。说明鲁迅对长衫非常敏感。在他的小说《一件小事》中,坐人力车的人就穿着长衫,拉车的肯定是短衣,到冬天也只能穿单衣。

鲁迅的小说《风波》里面写到的长衫更为典型。赵七爷一辈子就穿过三次宝蓝色竹布长衫,都是对自己有利、对仇家不好的时候。别人只要看到赵七爷穿着这件长衫走出来,就知道他肯定遇到了什么事情。最后这场“风波”降下去,也与这件长衫有关——七斤嫂发现赵七爷把长衫脱了,又穿回原来的衣裳,坐在书桌前。所以在鲁迅小说里面,服饰不仅仅是人物肖像的一部分,更与主题密切关联。脱了长衫可以说就没有孔乙己这个人物了,而没有宝蓝色竹布长衫,也就没有了《风波》这个故事。

包括金钱,在《孔乙己》中,鲁迅不但写到钱,而且写得特别精细:一碗黄酒需要四文钱,一碟茴香豆需要一文钱,孔乙己排出九文大钱,温两碗酒,要一碟茴香豆。小说的结尾,掌柜说,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。鲁迅的这个钱数不是随便一写,孔乙己即使喝一碗黄酒,都不敢标配一碟茴香豆,所以最后欠的是四碗黄酒、三碟茴香豆。鲁迅没有闲笔,没有废笔,每一笔都值得斟酌回味,这就叫经典。

为什么直到今天孔乙己仍有生命力?因为他是一个于历史夹缝中存在过的人,新和旧都与他无关,新的不会干,旧的他也干不了,所以就变成“多余的人”。他又好喝酒,又做不出什么成绩,写书也写不成。这种感受,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,每个人或多或少也会感受到。他是一个典型人物,这就是经典的魅力。

初读之时似曾相识
重读也跟初读一样

经典必须接地气,才有意思,而不能是高高在上。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有一个关于经典的定义:经典不是你正在读的书,而是你正在重读的书。意思是说,你没有读过这个作品,但一看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,因为生活里的很多道理都在这个书里面,所以觉得好像之前读过。重读也跟初读一样,比如《红楼梦》,读第五遍、第十遍,感觉都不同,因为你的年龄、经历、外部环境都在变化,读时的感受自然也会改变。

鲁迅小说也有着这样的特点,不是只有鲁迅的研究者、只有把《鲁迅全集》读了多少遍,才能读懂鲁迅小说,而是可以从很多很多的方向进入。比如《故乡》,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篇写故乡的美文,特别适合向初中生、高中生推广。《故乡》也不只有文字之美,也不只是“其实地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”这样的金句,它的故事具有多重性、复杂性。这就是经典的一个品质、一个特征。

鲁迅不是高高在上的神,但一般作家达不到他的境界,这里面有两个原因:一是自身水平能力不足,另一个是对于认识现实生活缺乏热情和兴趣。而鲁迅对普通民众的生存境遇有着深刻的感受,在一个普通人身身上,他会看到自己没有的东西,看到人性的光辉。鲁迅跟他所处的时代、跟他生活的社会,以及那个时代的社会民众有密切关联。他所有的作品都诉之于内,其文学性是自然生成的,具有多重智慧,很难用教科书去规范他,这也形成了我这本书的一个基本观点。